

YOUXIU CHUANTONG WENHUA DE CHUANCHENG YUCHUANGXIN

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秦海燕◎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Jili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全国百佳出版社



■ 作者简介：

秦海燕，1976 年生，汉语言文学硕士，高校讲师，现就职于潍坊科技学院。多年来，一直坚持在教学一线、新闻采写与宣传工作一线。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获全国二等奖，发表学术论文 3 篇，主持并参与课题多项，参与编写《青春飞翔——潍坊科技学院校园文化释义》，连续多年被评为潍坊科技学院宣传工作先进个人、寿光市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YOUXIU CHUANTONG WENHUA DE CHUANCHENG YUCHUANGXIN

责任编辑：宫志伟 陈增珩

封面设计：程娃娃

ISBN 978-7-5581-5305-1



定价：44.90元

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

秦海燕◎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

秦海燕◎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 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竞争激烈，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处于何种位置的关键因素就在于综合国力的较量。传统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的强弱已经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当今世界各国的较量越来越取决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较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遗产至今仍然有突出的价值，积极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有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塑造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优秀传统文化对树立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方面有着突出的价值。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告诉我们，对待古老而富有生机的优秀传统文化既要传承，又要进行创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时代价值。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创新发展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弘扬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扬，是在实践中自觉加以贯彻、提倡、发挥。只有通过创造的继承，和有继承的创造，才能在文化的发展中使文化的连续性和创造性得到统一。对传统文化的普遍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和改造，以使其焕发蓬勃的生命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由于涉及的研究内容广泛，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应用性，加之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缺点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进一步修改，使之日臻完善。

目 录

第一章 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	1
第一节 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1
第二节 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成就	4
第三节 优秀传统文化的其他成就	19
第二章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定位	25
第一节 深刻反思传统文化	25
第二节 传承发展必须坚持科学理论指导	27
第三节 传承发展必须坚持辩证地批判继承	28
第四节 传承发展必须坚持传承中创新	29
第三章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
第一节 本体农耕性	31
第二节 商业附庸性	34
第三节 传承异变性	36
第四节 文化冲击性	38
第四章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原则	41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融会贯通原则	41
第二节 大众化原则	42
第三节 超越性原则	43
第五章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对策	45
第一节 长效机制的建立	45

第二节 学术研究与大众普及的兼顾	52
第三节 传承内容的符号化	57
第四节 传承模式的日常化	61
第六章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促进网络文化的本土化	67
第一节 网络文化概述	68
第二节 中国网络文化发展现状及特点	75
第三节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对网络文化的影响	83
第七章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推动科技文化发展	101
第一节 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对科技文化创新的意义	101
第二节 科技创新的风险及控制	133
第三节 中国科技创新的障碍及对策	138
第八章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融入教育改革	149
第一节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对教育改革的意义	149
第二节 现代教育改革的内涵	154
第三节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改革的途径	169
第九章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拉动文化产业发展	178
第一节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179
第二节 文化产业的地位与作用	184
第三节 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88
第十章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推动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210
第一节 旅游文化产业的作用	210
第二节 旅游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11
第三节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对旅游文化产业的影响	212
参考文献	215



第一章 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体系，主要从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两个角度考虑。广义文化一般指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类活动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及其他一切成果的总和。广义文化体系复杂，分析其内在逻辑结构和层次时一般将广义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次。物质文化多指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劳动产品的总和，主要满足人类衣、食、住、行等生存需要。精神文化指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于物质形态之上的思想观念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包含文学艺术与思想观念等。制度文化多指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建立的社会规范的总和，包括经济、政治、宗教等制度与组织形式。行为文化多指人类交往中形成的风俗习惯等。广义文化的四个方面相互联系，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重关系。狭义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本书主要针对狭义文化中观念形态文化进行研究，以正确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批判其糟粕。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有中国特点的传统文化。“中国”突出了文化具有的民族属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性。“传统文化”则体现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学术界有多种理解。顾冠华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的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从过去发展起来的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反映；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存在于民族土壤中的稳定的东西，但又是动态的是过去与现在的交融，渗入了各个不同时代



的新思想、新血液。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传承下来的、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精神成果的总和。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西方文化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照。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铸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一）刚健有为

中华民族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这与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是密不可分的。《易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要求有志向、有作为的人像自然的变化发展一样，生生不息，永远向前。世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是不断进步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人类前进的动力。中国的哲人早在 2000 多年前，对此已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中庸》云：“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帔，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为也。”《墨子·法仪》云：“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人法之。”这些哲人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探讨人生精神，为中国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人类在与自然界的矛盾斗争中不断发展进步，人类时时被自然界所制约，人类又时时在改造着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加深，就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进一步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刚健有为正是中华民族完善生命、把握自身、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力量源泉。中华民族很早就已进入了比较发达的农业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也就必然深深烙上农业文明的印迹。在农业社会中尤其是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情况下，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是处于弱小地位的。正是这种弱小与强大的斗争，使中华民族更崇尚自强不息的精神，因此，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不停地讴歌着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

（二）中庸平和

“中庸”、“平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儒家经典之中，《中庸》位列四书，处于重要地位。《中庸》开宗明义，在第一章中就讲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三）天人协调

天地苍茫，星河浩瀚，古往今来的人们置身宇宙之中，无时无刻不在探索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天人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有着根本的差异。“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命题。

在中国文化中，对天的认识和思考决定了中国人的人生方向。郭象云：“天者，万物之总名。”（《庄子·齐物论注》）就是中国古代对天的认识的高度概括。中国古人认为，天是万事万物的根源，天是万事万物的总和，天道是宇宙万物的法则，更是人生应该遵循的必然规律。《易传》曰：“昔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总结的就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过程，剥去其神秘的面纱，其实是人类探索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的力证。在这个探索中，天被神秘化了，天成为了囊括一切、昭示一切、主宰一切的本源。这在《易传》其他章句中可以充分证明。

随着人们对天的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对人与天的关系如何定位提出了各种理论。如儒家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荀子的“天人有分”、刘禹锡的“天人相胜”等。但在中国文化的主流上，人们对天人关系的定位是“天人合一”。

至汉儒董仲舒时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被体系化了。董仲舒从形体方面入手，以阴阳五行学说揉入儒家思想，提出了“天人相类”的理论。

（四）道德本位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泛道德主义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道德本位的文化。在这个历史和社会中，任何个人的言行都要受到道德价值的制约与评价。从帝王以至庶民，都有一套道德体系约束着。每个人的社会活动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实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由此引发其他一切判断。正如儒家经典《大学》所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国传统文化对整个社会个体的要求就是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每个人都全身心地去实现自己的道德价值。孔子曾经讲：“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所谓君子，就是指品质优秀、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应该时时谨守道德规范，关心国家的典章制度，依法度行事，须臾不可放松自己的言行；而作为与君子相对照的小人，则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生活处境，只顾获取个人的小利。孔子



举出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正是为了鞭策人们时时以君子为榜样，以道德礼法约束自己，从而使整个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受道德本位影响，使中国社会政治表现为伦理政治的特色，道德价值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

第二节 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成就

一、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儒家思想的主体地位并不是开始就有的，它的形成、发展、兴盛和衰落反映着历史发展的规律，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兴亡息息相关。

（一）儒家的产生

探讨儒学的产生和发展，首先要面对儒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儒，关系到儒学的性质，我们可以大体进行一下考证。

东汉许慎云：“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说文解字·人部》）

东汉郑玄云：“《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儒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礼记·儒行》之《正义》引郑玄《目录》）

西汉杨雄云：“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法言·君子》）

西汉韩婴云：“儒者，儒也。儒之为言无也。不易之术也。”（《韩诗外传·卷五》）

东汉应劭云：“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讲诵而已，无能往来，此俗儒也。”（《后汉书·杜林伟》注引《风俗通》）

《周礼·天官》云：“儒以道得民。”郑玄注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贾公彦疏曰：“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

由以上关于“儒”的记载和训诂我们可以看出，无论解释为柔、优还是儒，儒都是一种具有特殊行为方式或品格倾向的人。这种人最初是与“方士”、“伎”联系在一起的。儒的产生是早于儒家学派的，而且儒家学派建立之后，也有些方士虽不是儒者却照样称儒。儒作为一类人究竟是怎样出现的，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胡适认为儒最初是殷民族的教士；冯友兰认为儒不与殷民



族有关；郭沫若则说儒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总之，最初的儒应是有知识、懂礼仪、具有独立人格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在春秋战国奴隶制度土崩瓦解的过程中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凭借自身的知识，依托于各诸侯、大夫为生计。

现代意义上的儒是孔子建立儒家学派以后产生的。儒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在太史《史记》中始有评论。《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后来班固在《汉书》中又把儒家列为诸子之首，言曰：“儒家者流，盖出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

这段话全面说明了儒家学派的来历、宗旨、始祖、宗师、经典以及影响。

（二）孔子及其思想

1. 孔子的家世与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享年73岁。

孔子的先人，为宋国贵族，是殷商后代，时人孟釐子曾说：“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史记·孔子世家》）服虔曰：“圣人谓商汤。”杜预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为宋华督所杀，其子奔鲁也。”（《史记·孔子世家》）始居鲁者，为孔子五世祖。孔父嘉之前为史籍所称道尚有二人：十世祖弗父何，本宋湣长子，当继嗣有国，以让国于弟鲋祀（宋厉公），声誉大振，世为宋大夫。七世祖正考父，佐宋之戴、武、宣三公，愈受命而愈恭谨，故考父庙之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左传》昭公七年）偻、伛、俯，其愈恭敬，人亦愈尊重。及居鲁后，孔子之父叔梁纥曾以战功显，因先妻所生九人皆女，妾生子孟皮又有足疾，故晚年乃娶颜氏女徽在为妻，而生孔子。叔梁纥与徽在年龄悬殊，婚时纥或在64岁之后，有违于礼仪，故《史记》称“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孔子生三岁叔梁纥死，自幼全靠母徽在哺育教养。“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在孤儿寡母的艰辛生活之中，孔子奋力自学的情景是不难想



象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17岁时就颇以“知礼”而闻名，是年，鲁大夫孟釐子将死，即告诫其子：“今孔丘年少好礼，……若必师之。”（《史记·孔子世家》），一说此事当在孔子24岁之时（清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一），其时，孔子母亲亦死，尚未弱冠的孔子便开始了独立谋生的生活。“及长，尝为季氏史（吏），料量平：尝以司职吏而畜蕃息。”（清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一）此即《孟子》所讲“委吏”与“乘田”，为季氏管理仓库账目与牛羊。大约自此之后，孔子曾去鲁，之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返鲁，适周问礼等，一直到孔子50岁时，由于史传记载甚少，难以确系其事。鲁定公九年，孔子51岁，“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中都县长），一年，四方皆则之。由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定公十年，孔子参与了齐鲁“夹谷之会”，表现了相当的胆识与外交才能。十三年夏，孔子提出“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的建议，并策划实施“堕三都”的活动。“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史记·孔子世家》），由于“堕三都”受阻，内政已颇有危机，又值齐国以“女乐文马”腐蚀鲁国国君，使鲁君“往观终日，怠于政事”。既然道不得行，孔子只好出走，周游列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游荡生活。“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此后，孔子即把主要精力用之于古代典籍的整理工作，直至终老。

2.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仁”

孔子作为中国儒家学派的奠基人，首先就在于思想体系的奠基。就是说，儒家学派的一系列思想学说，均以孔子的思想学说为根基和源头。孔子既开创了儒家学派，又是儒学的第一位大师，是“儒之所至”或“至圣”；而后世儒者，多数不能直接受教于孔子，其间私淑传承的纽带就是思想学说的联系。

仁，是孔子及儒家思想学说最基本的范畴之一。近代多数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仁，这是符合实际的。《吕氏春秋·不二》篇曾以一字列举春秋战国时期十家之所贵，其中孔子即为“贵仁”。《庄子·天道》载老聃问孔子学说之“要”，孔子答曰：“要在仁义。”《尸子·广泽》言“孔子贵公”，“公”字所指，亦为人际关系的平等，无偏无私，实亦“仁”也。说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表明孔子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正是环绕于“仁”而形成一整个体。

“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每一次仁的用法和用意都各有不同，但从整体上把握来看，孔子的仁学思想是一个由近及远的四重结构，而这四重结构又互有交叉渗透。孔子的仁学思想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三）董仲舒及其思想

1. 董仲舒的生平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东北广川镇）人。据清人苏舆推算，约生于汉文帝前元年（公元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尝“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治学，精思专一，志无他顾。故菜园虽在门庭，亦无暇窥视。或曰，仲舒尝乘马，而不觉其牝牡，亦言其志在经书。”（见《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引邹子语）此人格，亦很受称道：“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书·董仲舒传》）武帝征贤良对策，颇得赏识，“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虽骄悍好勇，仲舒亦能“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治国，主张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时有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以为这是上天对当政者的谴告，并由此推说当杀亲近权贵以自省。说刚草具，被主父偃偷而上奏，几乎招致杀身之大祸。由是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与仲舒并世的公孙弘亦治《春秋》，其学不如仲舒，却以曲阿迎合之术，位至公卿。仲舒为人廉直，声望益高，弘嫉之，欲加害仲舒。武帝之兄胶西王刘端为人纵恣暴戾，曾数害大臣，弘乃荐“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幸刘端亦知仲舒为当世大儒，竟“善待之”。仲舒亦恐时久获罪，乃称病免归。居家始终不问产业，专以修学著书为事。朝廷或有大议，尝使使就其家而问之。终老于家。

《春秋繁露》本传言：“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书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依此，则《春秋》诸说当在“百二十三篇”之外。又，《汉书·艺文志》载，《诸子略》儒家类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六艺略》《春秋》类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至《隋书·经籍志》，始于《春秋》类著录“《春秋繁露》十七卷”，“《春秋决事》十卷”。今存者，仅《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另有本传中之“天人三策”，及《汉书》、《食货志》、《五行志》中所引仲舒疏奏之片断。对于“繁露”（或“蕃露”）二字何解，《南宋馆阁书目》曾言：“‘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释者。案《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冕无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二十二子·春秋繁露》卷首）董仲舒的主要思想观点，均见于此书及“天人三策”等文字中。



2. 天人感应学说

天人感应学说，是一种以天为主宰的天人合一论。这既是董仲舒思想的核心，也是西汉今文经学的主导观点。

（四）朱熹及其思想

1. 朱熹的生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亦称晦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遁翁等。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卒于宁宗建元六年（1200年）。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与李侗同学于罗从彦之门，曾举进士，历官司勋、吏部郎，因不附和议忤秦桧，出任福建尤溪县尉。建炎四年罢官，寓尤溪城外毓秀峰下郑氏草堂，遂生熹。“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松异之，就傅，授予《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丛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宋史·朱熹传》）

熹年十四丧父，遵遗嘱师事籍溪胡原仲（胡宪）、白水刘致中（勉之）、屏山刘彦冲（子晕）三人。刘勉之以女妻之。二刘早歿，熹从胡宪习业最久。年十九登进士第，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其间治绩卓著，公余并究释老之学。年二十四徒步数百里往受学于延平李侗，承洛学传统，悟二氏之非。28岁（绍兴二十七年）自同安罢官归里，此后曾三次往延平问学，师事李侗，久益不懈。孝宗即位（1162年），诏求直言，熹上封事言：“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又言：“修攘之计所以不定时者，讲和之说误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宋史·朱熹传》）次年（隆兴元年），复召人对，再申前议，主“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宋史·朱熹传》）。并陈古先圣王强本折冲、威制远人之道。时宰相汤思退力主和议，熹之主张不被用，于是4年之间，虽屡蒙召用，辞不赴召者达6次之多。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来访，留居旬日，共编《近思录》，又由吕祖谦邀请，与陆九渊兄弟会于鹅湖，因与陆讲论不合而散。淳熙五年（1178年），年49岁，辞官隐居已逾20载，知南康军，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作学规。逾3年，陆九渊来，熹请陆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以为切中学者时弊，同年（淳熙八年），除直秘阁，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不久，因弹劾唐仲友并与宰相王淮不和辞归。自此，虽屡有任命，多辞不就，而屡向孝宗直谏，无所顾忌。淳熙十五年（1188年）上“戊申封事”，言：“今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急务，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



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宋史·朱熹传》）

时朱熹之名渐重，屡仕而又去。诋毁朱学者亦渐重。陈贾为监察御史，面对孝宗，首论之曰：“道学者，大率假名以济伪。愿摈弃勿用。”盖指朱熹。本部侍郎林栗曾与朱熹论《易》、《西铭》不合，因劾曰：“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其伪不可掩。”（《宋史·朱熹传》）上曰：“林栗言似过。”太常博士叶适亦上疏与栗辨，谓其言无一实者，道学云云，无实尤甚。遂黜栗。宁宗即位，赵汝愚首荐熹及陈傅良，除焕章阁待制、侍讲，辞，不许。多所献替。曾奏勉上讲德云：“愿陛下日用之间，以求放心为本，而于玩经观史，亲近儒学，益用力焉……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长，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所。”（《宋史·朱熹传》）时韩侂胄自恃有定策功，居中用事。朱熹即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在讲筵复申言之。遂除宫观。庆元二年（1196年），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门人元定亦送道州编管。自此，“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宋史·朱熹传》）自朱熹去国，韩侂胄势力日张，中司何澹希旨，首论专门之学，文诈诋名，乞辨直伪。刘德秀亦因在长沙时不为张拭之徒所礼，恨之。及为谏官，首论留正（时为宰相）引伪学之罪。“伪学”之称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纯亦谓“比年伪学猖獗，图为不轨”。右谏议大夫姚愈亦论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神器，或竟有上书乞斩朱熹者。时“土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异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宋史·朱熹传》）庆元四年，熹已年近七十，申秘致仕，五年依所请。逾年，卒，年七十一。朱熹死后，于嘉泰（1201年）初，学禁稍弛。后韩侂胄死，嘉定元年（1208年）赐谥曰文，故世人称朱文公，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追封信国公，绍定三年（1230年）追封徽国公，淳佑元年（1241年）配祀学宫。

朱熹的著作，依《宋史·朱熹传》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耆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遗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楚辞辩证》、《韩文考异》。

所编次者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又《仪礼经传通解》未脱稿。平生所为文，成《文集》百卷及《语类》80卷、《别录》10卷。